

## 维新何以成“运动”： 以《时务报》报费的流向为个案

朱至刚

**摘要：**文章以《时务报》被外埠派报处拖欠报费的数额、成因及其去向的分析为个案，试图探究其中蕴含的资源调配机制。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发现与报馆主事人存在密切人际关联的“亲友派报处”总体上更倾向于延迟将报费交给时务报馆，由于“亲友派报处”在外埠销量中所占份额较大（通常在60%左右），这就造成了时务报馆应得的报费大比例、长时期沉淀在它覆盖所及的区域（尤其内陆地区）。这种情形，当然不利于报馆自身的运营。但被“亲友派报处”拖欠的报费，却有相当部分，很可能被维新同道挪用于在地开设其他新型建设。而且，在如湖南等本地财力并不丰裕的内陆地区，往往还是维新同道的唯一选择。就此而言，《时务报》遍及举国的发行网络是维新中人融合资源的中介平台。在财力、人力和发行网络上的互助，实乃维新各报的相处常态。藉此个案，也许能对维新何以迅速在空间和群体上延展开去，成为举国运动的内在机理略有管窥。在这样流动性的共享体系里，时务报馆担当核心，既出于实力雄厚，也是“土道”的情理使然。

**关键词：**维新运动；时务报报费；资源融合；中介平台

**中图分类号：**G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18)01-0109-08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3YJC860045)

戊戌维新被称为“运动”，在中国学界由来已久，更是习惯称谓。暂且不论语义是否演化，单就其描叙力度而言，的确名实相副。若以各类新型建设的过程为观察点，不难看到以下三点特征。第一，往往由民间率先发起。第二，主动参与者之多，几近遍及整个士林。第三，遍及几乎所有省域和诸多中等城市，与此前此类事业，如非官方运营，大多局促沿海、沿江都会恰成对比。也正是具有动力、群体和空间的面相，“维新”才既不只是朝堂的内部更化，更非先驱者的书空咄咄，而是真正具有举国意义的社会运动。然而从甲午战败到明定国是不过三四年，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文化总体水平以及国内的交通、物流状况均未发生显著变化，这场运动是依托怎样的运作机制，才能几乎仅凭民间之力，以新型建设为载体迅速牵动全国？<sup>①</sup>进而言之，为何这一机制到甲午后才现出这般功用？此前的相关研究，已藉对《时务报》的分析，对其中机理略有管窥。具体而言，该报能够迅速筹措到相对充裕的资金，乃至搭建并在不短的时间内维持相当程度上超越商业物流网络制约的发行网络，与“士林”同道在举国范围内的既在与遍在存在密切的相关。就此而言，以“土道”而非“市道”作为往来的基本规则，实乃士林中人行动中的(in action)共识。<sup>②</sup><sup>[2][3][4][5]</sup>然而，这样的维系机制，除了将广袤的内陆地域纳入宣

<sup>①</sup>在目前公开的材料里，仅有湖南曾对非官方创立的学堂、学会、报刊等文化方面的维新建设有持续性的直接投入。例如1898年3月创刊的《湘报》，曾每月从藩库领取200两津贴。

<sup>②</sup>这里对“土道”与“市道”的差异略做介绍。在戊戌的维新人士中，对此表述最为清晰地当属王修植。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梁启超已去，继任的郑孝胥尚未到位，《时务报》论说稿源大成问题，正在办《国闻报》的他主动向汪康年表示：“贵馆论说如有应付不及之处，尽可由敝处每月寄数次，弟等当与严又老勉力为之，以副雅属，至每文给值若干，大可不必，此非市道交也。”虽说王氏并未提出“土道”，但以他与汪康年的身份，以及对“市道”的描叙来看，应当认为在同道艰难之际，还要求“每文给值若干”，实非士林中人应为。实际上，这样的身份认同和行为准则，不但在维新中人被普遍践行，而且还是他们自认为比起商贾的道义优势。譬如邹代钧在读到首期《时务报》后，就如此赞许：“此报名贵之极，读书人无不喜阅，惟不便于商贾，盖于卷尾编列货物价值表，既无伤于书之体例，而大腹商贾必乐观也。”看似在兼顾商贾，但却丝毫没有掩饰身为读书人的优越感。

传维新,进而动员社会的交往体系,还为维新报业带来了怎样的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是否从中还可管窥维新何而成“运动”的内在机理,尤其是在空间上的扩散动力?这是本文拟考察的问题及线索。自然,所谓“意外”仅只表明未必在报人及同道的预料中,对于维新全局不见得就是负面。

### 一、时务报馆被拖欠报费总额分析:基于报馆公布的相关数据

在此前的相关陈述中,似乎时务报馆虽然得到多方援助,经济状况却从来不好。算上改名后的《昌言报》,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发出创刊启事,到光绪二十四年十月歇业,时务报馆存在了31个月(光绪二十四年有闰月)。在此期间,它曾四次公布阶段性收支总表,分别刊于《时务报》第18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一日出刊,公布光绪二十二年五月至十二月情况),第37册(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一日,公布光绪二十三年上半年情况),第52册(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一日,公布光绪二十三年下半年情况),《昌言报》第3册(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出刊,公布光绪二十四年上半年情况)。从所列数据,可得下表1。

表1 时务报馆各阶段账面收支状况统计(单位:元)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至十二月	光绪二十三年上半年	光绪二十三年下半年	光绪二十四年上半年(含闰三月)	总计
当期捐款	9452	6890	1496	832	18670
当期总收入	20757.82	20535.2	17074.8	14812.5	73180.32
当期总支出	14191.3	17531.1	23190.1	18079.1	72991.6
当期结余	6566.52	3004.1	-6115.3	-3266.6	188.72
当期扣除捐款后结余	-2885.48	-3885.9	-7611.3	-4098.6	-18481.3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强学报·时务报》《昌言报》。

仅看该表,27个月下来,亏损看似高达18481.3元,如果不是同期又得到18670元捐款,根本就无法维持下去。难怪谭嗣同看到首次报表后,表示“惟以捐款近万元(均已收者)未确实之本钱,而存止七千元,是折阅三千元矣。去年仅半年而亏将三千,再过两个半年至本年年底,七千可尽矣。”<sup>[6]</sup>如果情况仅止于此,身为总理的汪康年当然难辞其咎。然而除了四次报表,《时务报》还在第39册(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出刊)和第59册(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一日出刊)两次刊出“本馆寄报收款清表”,公布此前各派报处的销售和报费缴纳情况。两次清表涵盖时段为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到光绪二十三年底,根据这些数据,整理出表2。<sup>①[7][8][9][10]</sup>

①关于时务报的销售量,梁启超、黄遵宪等人都有表述。当然,最有效的还是两次清表刊出的数字。截至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六月,报馆自派订阅丙申年报800份,丁酉年报1268份,旧年报(也即丙申年报)16份;赠阅丙申年报68份,丁酉年报95份;零售丙申年报1768本,丁酉年报2276本,旧年报(也即丙申年报)225份;同时段派报处共代销丙申年报4285份,丁酉年报9930份,三年订户14份,旧年报1445份,零售12627册;一次清表中载明“表内所谓全年指去岁秋初至今今年夏末而言,丙年丁年则分指去今各半年而言”。截至光绪二十三年年底,报馆自派的光绪二十三年下半年订量新增995份,另售出旧报3份,零售2081本,缩印报167部,旧报116部又71本;赠阅本年报122份,旧报1部,缩印报48部;同时段派报处代销的光绪二十三年下半年订量增加6893份,缩印本1138部,旧报1109部,零售41817本。据《时务报》第3册(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刊)告白栏,《时务报》的定价是“本馆价目:凡先行挂号交报费十两者送报五年,先交十元报费者送报三年,先交四元报费者送报一年”“先阅报后交费者每年四元五角,以上远近一例,惟直隶山东河南四川广西每册须加信资二分,东三省山西陕西贵州每册加洋四分,甘肃云南每册加洋六分”“拆购者每本一角五分”。另外,据第23册(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出刊)告白,丙申年合订本售价每份2.5元。第37册(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一出刊)告白,从第1册到第30册的缩印本每份也是2.5元。此后,该刊第44册告白刊出“又一期以后之报,现约预备一二百分,如欲零星购补,亦可照奉,取值均按旧例。”这应是二次清表中所列“旧报”的内容与售价。本文中的销售量即是依据两次清表中所列各类数量和上述价位算出。时务报馆给派报处的报酬是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以前每代收10元,可提取2元;如果是药房、货栈等商业机构,又分销10份以上,每份每年则只需向报馆缴纳3元。该年九月以后,一律改为不管销量多少,统准提留两成。参见《时务报》第1册告白(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一日出刊),《时务报》第9册告白(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出刊)。

表2 时务报馆各阶段报费应收与实收情况统计(单位:元)

	派报处应缴纳总额元	派报处实际缴纳总额元	缴纳比例(%)
至光绪二十三年六月止	30822.96	14852.56	51.34
至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止	53726.64	28116.5	52.33

资料来源:《时务报》在第39册和第59册两次“本馆寄报收款清表”。

虽说统计时段不完全一致,但综合起来,仍可推知表1所列应是实收而非应收报款。由此亦可知,汪康年在该年七月致张之洞电文中称“丙夏起,戊六月止,共收七万四千余元,共用七万二千余元,实存二千数百元。另代派欠约八千余元,存货六千余元”当属实情。<sup>[14]</sup>虽说并不存在会计意义的亏损,但从资金运转来看,这些被长时间拖欠的报费,实质上近乎资金流出。

## 二、时务报馆被欠报费的流向:以派报处类型为考察线索

这样的状况,对时务报馆自身的运作自然极为不利。那么,这又是由什么原因造成,这些被拖欠的报费又流向了哪里?此前的相关研究已揭出《时务报》的发行颇得助于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核心成员存在学缘、乡缘、同事、同好等人际关联的友好。在该馆146个外埠派报处中,至少有46个是主持人与报馆同人存在较近关系的“亲友派报处”<sup>[15]</sup>。不妨沿着这一思路,做进一步细化分析。再考虑到派报处所在的城市是否地处苏南、浙北、沿海以及宜昌以下的长江干流段,根据它们与上海保持物流、汇兑的难易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可将所有派报处分为“口岸—亲友”“口岸—非亲友”“非口岸—亲友”“非口岸—非亲友”四类,它们在两次清表所涉时段的缴纳情况见表3:

表3 各类派报处各时段缴纳情况统计(单位:元)

类型	数量	至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应交	同期实交	当期缴纳率(%)	至光绪二十三年底应交	同期实交	当期缴纳率(%)
口岸—亲友	23	8628.89	5246	60.79%	14435.16	9394.2	65.07
口岸—非亲友	78	10514.52	7408	70.27%	17213.24	11396.2	66.2
非口岸—亲友	23	8842.68	2185	26.51%	17375.48	5148.1	29.62
非口岸—非亲友	22	3307.04	965	29.17%	4576.16	2156	47.11

从表3可看到口岸地区派报处的缴纳率高于非口岸地区。须知对《时务报》同仁来说,尽快强化空间覆盖远比盈利重要。而在非口岸地带,以亲友派报处为搭建发行网络的主要节点,既是可行更是别无选择。然而,由于发行网络的空间覆盖上超越了同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口岸体系,受制于汇兑等因素,非口岸地区的报费相对难以到馆,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为何无论是否在口岸地带,亲友派报处的缴纳率都低于非亲友派报处?物流、汇兑等条件应不是造成以上变化的主要原因。好在下列5个亲友派报处的来款过程,在与报馆的通信中记载得很清楚。籍对它们的过程细察,也许能找到其中成因。

### (一)长沙矿务总局

首先考察长沙矿务总局,基于两点原因:第一,截止光绪二十三年年底,其代售总额为4837元,居所有派报处首位。第二,从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到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邹代钧和汪康年互通信函平均每月至少2次,仅在邹的来函中,提到报刊发行的就有52件,在材料上也最为完整。<sup>[15]</sup>

邹代钧在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来函中表示“敝处共收《时务》《昌言》两款四千余元,截今年底止,又售

<sup>①</sup>在这段时间里,邹代钧至少致函汪康年58次。而且从邹代钧在第二十函中提到“我之复信,虽不如公来信之多,然二三次必有一次复者”。



书洋百余元,容缓开细数呈核,不知尊处所收图款,足以相抵否?”<sup>[5]</sup>此后,又在二月初做了进一步说明“敝处所用《时务报》《中外日报》两馆款,约近四千元,兹将清单寄上,祈察核,未知尊处所收图款足相抵达否? 祈示。”接下来是明细清单:“丙申下半年,每期来报六百册,计出报五百四十七分,零报一百七十八本,除下存报六十八分。丁酉上半年,每期来报九百册,计出报八百六十四分,零报七十本,余下存报三十二分。丁酉下半年,每期来报八百册,计出报六百五十五分,除下存报一百四十五分。自丙申七月起至丁酉十二月止,以半年扣算,共来报二千三百分。共出报二千零六十六分,合零报,除下存报二百三十四分。(戊戌三月付汪带去)戊戌上半年,每期来报八百册,计出报六百二十七分,除下存报一百七十三分。戊戌下半年,《昌言报》每期来八百册,计出报三百一十五分,除下存报四百八十五分。戊戌年以半年扣算,共来报一千六百册,共出报九百四十二分,除下存报六百五十八分。统共计算,该收洋五千九百三十六圆零七分五厘,现收洋五千六百四十九元柒角壹分七厘,余二百八十六圆三角待收,除二成洋一千一百三十元,下实存洋四千五百一十九元七角一分。”<sup>[5]</sup>

据该函可见,此前他实际缴来的报费,跟《时务报》第59册所刊第2次清表上所列的3352元应大有出入,否则怎能有4500多元存留? 其间可能只托熊希龄转交了400元。<sup>①</sup>也算事出有因,据《时务报》第1册所刊告白,时务报馆也在替邹代钧主持下的舆图公会预售地图票,售价为全图每份50元,半图每份25元。<sup>[7]</sup>在光绪二十二年腊月,邹代钧就提出,截至目前“报款大约已收七八百元,鄙人已用去五百余元(所谓鄙人者,指图局也,非我私用,当分别)因贵处已代售图票二十余分,故敢用耳。今春尚可收得数百元(右帅允行湘省各书院,日内可行)缓当寄上。”<sup>[5]</sup>双方相互代销,又照码洋互抵自无不可。但此后报款的增长速度却明显高于图款。根据《时务报》第39册所刊首次清表,截止光绪二十三年七月,长沙矿务总局派报处应缴报费3780元。<sup>②</sup>与之相应,截止该年六月,时务报馆共售出半价25元图票98份,全价50元图票4份。<sup>③</sup>即便时务报馆完全免费代销,图款(合计2650元)与报款相抵,也有1130元的差额。至晚到该年八月,汪康年又应邹代钧和熊希龄之请,从图款中划拨了1000元给上海吴云记商号,用于购买开设《湘报》所需设备。<sup>[5]</sup>以此推算,扣去此前熊希龄交来的400元,此时舆图公会已欠了时务报馆1730元。也许正是看到差额拉大,邹代钧旋即表示“缘报款不少,经鄙人用去者近千元,不知尊处所销之地图所获共若干? 务恳查大略示知,彼此足以相敌,方敢取用,否则仍缴还尊处为妥。”<sup>[5]</sup>但据前引光绪二十五年二月来函中的“敝处所用《时务报》《中外日报》两馆款,约近四千元,兹将清单寄上,祈察核,未知尊处所收图款足相抵达否? 祈示”,这笔钱不仅没送到,且已挪作他用。<sup>[5]</sup>从邹代钧该年绘制和刊印首批地图,就用去3000多元看,应该就是其去向。<sup>[5]</sup>

邹代钧又为何会挪用,或者说得客气一些,借用这笔报款? 据《时务报》第1册刊出的《译印西文地图招股章程》,他主持下的舆地学会正谋划纯以国人之力,完成宏大的舆图绘制工程。“东三省蒙古新疆兼俄罗斯亚洲地图百幅,内地直省各图二百六十幅,亚洲一百一十一幅,欧洲之五十四幅、阿州之三十一幅、澳岛之八幅、美洲之九十一幅、各海洋及两极之下十二幅、每幅方百四十平方寸。”<sup>[7]</sup>按光绪二十二年的预估,仅校勘、测绘、租赁房屋各项费用就需21500元,加上印制1000份成图,约需31000元。<sup>[7]</sup>这也是近代中国地图科学研究与传播的源头。然而这笔钱从哪里来? 邹代钧在士林中的地位颇不及黄遵宪和汪康年,舆图学会也就难以如时务报馆那样能迅速汇聚举国土林的援助。当时湖南财力本非雄厚,还百度维新,诸如实业、学堂、学会、报刊处处都在用钱,一时也难顾全看似不急之务的舆图。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暂且挪用报费,还能有何选择? 更何况于私谊、公业,邹代钧都早对时务报馆不遗余力。光绪二十二年初,汪康年刚到上海,一度经济拮据,就是经他促成,才拿到矿务总局每月40两津贴。在报馆的筹建阶段,也是他说服陈宝箴从湖南藩库中拨出四百两作为捐款,还札伤湖南官方购阅。光绪二十二年八九月间,《时务

①该函发于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二,函中有“沉帆嘱带《时务报》费四百元,购书费一百元并信件交阁下”。

②据该次清表,长沙矿务局派报处共承销“两年五四八分,又四本;丁年八〇〇分”。丙年,即光绪二十二年,《时务报》出报半年;丁年,即光绪二十三年则为全年。

③《时务报》第19册(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一出刊)告白栏称共售出“半价二十五元之散票七十七分,已收全价五十元之散票四分,已收全价之二十五元半票二分”。此后仅在第32册告白中称续售“二十五元之散票二十一分”。

报》在湖南的推广一度不畅,他又表态愿意揽下全省的派报工作。<sup>①</sup>其实也不难理解为何汪康年等人在报款上会对邹代钧格外容让。甚至在刊出清表,催促各处之际,还要在账面上为其掩饰。所谓士道之交,本来就应该是彼此的互助,而非是单向的奉献。况且倘若不带预设成见,从长期看来,舆图对读书人见解的开化作用也未必就一定弱于报刊。

## (二)重庆东川书院

相对于邹代钧,重庆的宋育仁、江瀚、潘清荫等人对时务报馆付出颇有不及,所求和所得却更为直接。截止光绪二十三年底,重庆东川书院派报处总共该缴179元,但却没有汇来分文。而且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之前,他们还为在重庆设报,请汪康年在上海代为购置所需的铅字等设备。重庆虽是通商口岸,却因三峡阻隔,与沿海往来并不便捷,此时的四川亦几无近代工业基础,托同道购置机械,本也是唯一的可行路径。但更重要的是,购置的款项都是由时务报馆先行垫付。在是年九月一日发出的信函里,潘清荫写道“尊处垫付之二千六百元,又加印机运费、箱索、购书、购报、传电各费,除已寄银千两外,本月中旬即续兑五百两,如有在钱庄通挪应认息金若干,均请开列,得示即如数汇缴”<sup>②</sup>。此后又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五日承认:“前承代购模机及书报各项,除刘君代兑三百五十元外,尚欠二百几十元,兹仍由刘君汇兑现银一百两,暂请察验收。……再前兑一千七百以外,四月望日曾兑百金,计收到。”<sup>③</sup>若以每两约等于1.4元计,对照两函,不难看出第二函中承诺的“本月中旬即续兑五百两”并未及时足额兑现。此后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也就是《时务报》改名的《昌言报》都停刊三个月后,据潘清荫自己的说法,连报款带垫款,仍拖欠413元。<sup>④</sup>宋、潘等人所设之报,便是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开始出刊的《渝报》,这是四川乃至整个西南首份国人自办的维新报刊,对当地读书人阅读空间和知识世界的作用自不待言。而且他们也得到蜀中士林,尤其是尊经一脉的大力支持,但筹集资金需要时间。此报能够开成,时务报馆提供的人力援助和事实上的资金融贷功不可没。

根据以上两桩个案,可以得到这样的推论:时务报馆被内陆地区-强关系派报处拖欠之报款,至少有部分沉淀为主持派报处的同道中人在地开创维新建设的启动资本。正因为时务报在各省的销路大多不错,累积的报款逐渐增多,对于那些本地可用资源没有那样充沛的维新中人,才愈发成为既在士林的交往规则下不妨用之,更因自身急需非用不可的救急之源,这对时务报馆当然造成了损失,却促进了这些非口岸地区的开化新风。

依据此上分析所得的思路,再来考察下来款具体过程可复原的3个口岸地区的亲友派报处。

## (三)杭州智观巷

在上述两个时段,它分别拖欠603元和501.76元。吴以荣曾在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三日称“惠家君书,备悉报馆之款。此间正逢节近,一刻难筹,迟日奉上。”<sup>①</sup>此后又在十一月初五来函中表示“屡奉家君手书,备悉馆中用款支绌,入不敷出,闻之弥切念,此间入款亦不易收,开漕在即,用款尤繁,而馆中情形如此,故先兑上四百元,下余之数,待开漕后陆续奉上”<sup>②</sup>实际上,截止次年闰三月,也才交来410元。<sup>③</sup>按时征收漕粮,正是江浙州县官的重要职司,这笔钱应是被吴德潇挪去应急了。这笔欠款虽说不是直接用于维新建设,但吴德潇在彼时的维新中人里如药中甘草,能让各路人马和衷共济。保住他的官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亦是对维新建设的人事支撑。

## (四)广州时务书局

<sup>①</sup>邹代钧在第三十五函(十月初九)中称“报以后请寄四百份为率,而校经堂之百份祈不必再寄。千万,缘陈以去,曾欠妥也。六、七、九三期均未交伊,非鄙人欲揽此生意,实有确见,不能不奉知也。此后又在第三十八函中称“至授经书院之报,均已屡言之,其人不可靠,不可寄售。自第六期(大率如是,容再查明)以后均归敝处收存矣”。

<sup>②</sup>潘清荫第十四函(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廿九日发)“承示垫款尚欠四百十三元,久应归还……今勉为设措,先兑洋三百五十元,请给收据”。这里的“垫款”应该包括了报费。

<sup>③</sup>吴以荣在第三十六函中称“现在之窘,较尊处更甚,且不可思议,实在无可设法,来函甚急,故于无可设法之中,筹洋两百元,交来人奉上。”该函只署二十二日,但从问到汪康年游历日本来看,当在光绪二十三年腊月。此后他又在第三十七函中说“去腊二十八日奉到二十七日手书,知报馆欠款尚未收到,惶悚之至,缘荣自别后,于十六日抵浙,事冗不及兑申,且无妥人,故不敢寄。至二十二日,适有钱塘库书邵六加解米至申,令其带两百番至申,交足下手收。邵书坐轮船至申,二十三必到,敝意必可符公二十四之约,今竟不然!奈何。八日”。

梁启超和汪康年的表亲孙士颐都是广州时务书局的股东。还在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孙士颐就在来函中提到设此书局,是为拓宽当地读书人的阅读范围。所以,他请求对书局分销的《时务报》给予特别优惠,甚至允许自行加价。<sup>①②</sup>截止光绪二十三年底,时务书局当缴纳报馆200.8元,却只到账1元,其间差额实际上就成了书局的运营资本。

### (五)武昌善后局

由叶瀚打理的武昌善后局派报处在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前缴到576元,缴纳率63%。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缴到1730元,甚至把该扣下的两成一并交到。纳入分析范围,是因为它也一度可能成为向时务报馆借用资金的大户。诚如前论,叶瀚和吴樵、谭嗣同、张通典等人,一直谋划在汉口办报。还在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吴樵就向汪康年提到了这一构想。<sup>④</sup>该年十月,叶瀚表示准备“在汉口盘汉馆作为《时务报》总转运局,而兼办《工商日报》,籍日报之费为局用。”<sup>⑤</sup>接着,吴樵在十一月初提到在汉同志,已决定将它定名为《民听报》。<sup>⑥</sup>但接下来的筹备并不顺利,时任湖北藩司的王之春,原本答应资助三千元,却因报名带了“民”字,故以“不助民党”为由,未予兑现。叶瀚只得请求时务、知新两馆,各贷给1500元,并承诺此后,不再向两馆收取代办报酬。<sup>⑦</sup>此后,谭嗣同在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再次提出“拟请待今年年底报馆出入账目结清,如果赢余甚多,可专提一款往汉口办《民听日报》,每年归息,视同放债一般。”<sup>⑧</sup>话说到这样,其情实在可悯。但从表1中,可以看到时务报馆在该年年底,已出现6115元的账面赤字,纵使有心,怎还有力?也许这正是《民听报》没能办起来的重要原因。

从以上三个案例,尤其是武昌善后局的案例看来,口岸地区的亲友关系派报处所以会在缴纳率上表现愈发良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地方可募集的财力原本就较为充沛,挪用报款未见得是唯一出路。但若发生调度困难,向汪康年等人求助时,时务报馆的有限资金已经沉淀在内陆,未必就是报馆不愿借出。

## 三、以《时务报》为中心的维新各报馆互助

透过上述剖析,可知时务报馆对于举国范围的民间资源,亦非单方面的集聚,而是始终与同道中人在“士林”的交往规则下互通有无。当然,各地同道所借用的资金,往往原本就来自他们所在地域,从这个意义上讲,《时务报》的举国覆盖,不止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也可以被视作在构成“全国”的各个区域吸纳汇聚本地资源,襄助当地士人于“维新”不仅在场,亦复入场的周转中介。

实际上,纵观戊戌时期,在相继开设的各家维新报馆之间,相互支援、协作实乃常态。除了资金,人力资源的相互融通也屡见不鲜。既然要办报,仅在报馆内部,经理、主笔、庶务、访员、技工、杂役等各类职位,都既需要有人专司,又最好能位相称。但在戊戌以前,单个士人的交往空间难以跨越地域、血缘、学缘等人脉关系的界限。在他与同馆同仁熟悉的范围内,未必能够及时找到这样多合适的人手。除了仰仗其他同道,各家维新报馆亦需相互请托,代为物色。仅在《汪康年师友书札》所辑来函中,就有至少三起此类案例。具体情况参见表4。

表4 维新各报馆之间的人事合作统计

时间	请托人	受托人	代寻类型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	江瀚(蜀学报馆)	汪康年(时务报馆)	西文翻译、排印工 <sup>④</sup>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	蒋黻、罗振玉(农学报馆)	汪康年(时务报馆)	西文翻译 <sup>⑤</sup>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	熊希龄(湘报馆)	汪康年(时务报馆)	印刷机操作工、排字工 <sup>⑤</sup>

资料来源:根据《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3册相关书信往来整理。

<sup>①</sup>孙士颐在第二函(四月初六发函)中称“书肆原拟自行举办,现因中西报刻梁卓如、陈子褒、谭仲鸾、谭伯荪四孝廉,顶受双门底六雅斋铺址,开设时务书局。其意见为广开风气,嘉惠士林起见,与敝人之意相同,且同托贵馆购书,似不宜分作两处。现已访见陈、谭诸君,商量合伙。”此后在第三函(五月初一发函)中表示“此间既名时务书局,非有千金,西书不能错备,且亦不能支撑店用也。派报一事,如蒙见委,拟请统交敝店。如每套先付三元者,由敝店发交派报,各处取价三元五角(须代销廿分以外先付费者,方照此例),其取阅一二分者,仍取四元,以清限制。”



同时,各家报馆还将原本由自己独力创办的营销渠道,用于同行分享共用。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在商定的区域内,为对方代办发行,情况参见表5。此外,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开始,《时务报》《实学报》《蒙学报》《农学报》《知新报》《萃报》等6家报馆,还在京师琉璃厂土地祠内联合设立总报局,由户部主事张小义总揽主持各报在京发行。<sup>[12]</sup>

表5 报馆共享渠道统计

请托报馆	受托报馆	受托区域	起止时间
时务报馆	知新报馆	澳门	光绪二十三年年初起
知新报馆	时务报馆	除广东外其他区域	光绪二十三年初 <sup>[8]</sup>
利济学堂报	时务报馆	全部区域	光绪二十三年六月起 <sup>[8]</sup>
实学报馆	时务报馆	全部区域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后 <sup>[9]</sup>
湘学报馆	时务报馆	上海周边地区。 <sup>[4][8]</sup>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后
国闻报馆	时务报馆	上海及东南各口岸 <sup>[9]</sup>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后
蒙学报馆	时务报馆	全部区域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后 <sup>[13]</sup>

资料来源:根据《强学报·时务报》第2册、第3册,《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从上述描述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在诸家报馆的相互协作中,时务报馆显然处在中心位置。单从代办发行的范围上来看,就是它有求于各馆少,而各馆有求于它多。倘若从商业营销的角度进一步落实,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首先,从网点上来看。早在其他报馆相继出刊以前,时务报馆的发售网络就已相当齐备,其实并不必需它们加入进来。例如在知新报馆筹建成形以前,在广州一城,时务报就已至少有鸿安栈、中西报馆、全心堂书坊、时务书局等4个代办点。它们在光绪二十二年,就已经为《时务报》寻得了601个订户。<sup>[9]</sup>即便在知新报馆以书局名义加入以后,它的代售数额也只占到广州一地的8%左右,而且到账比例(21.5%),在广州的代办点中,也算偏低。与之相反,时务报馆的发行网络所以能规模庞大,首先是因为报馆同仁,尤其是汪康年在士林中人脉宽广,知新报馆同仁以康门人士为主体,这恰好是他们在全国范围内的弱势。实际上,如张元济、杨锐、邹代钧等人,都是先因为要代办《时务报》,才顺带着也承接其他报刊的。其次,从成本-收益来看,在互代发行的过程中,时务报馆所得,也较其他报馆为少。戊戌时期的维新报刊,发行量究竟多少,截至目前,除了《时务报》,其余各报都无从详考。但根据现存材料,仍能做一些间接推算。例如高凤谦在光绪二十三年三月致汪康年函中说“《知新报》闽中阅者颇少,论说、译件均不如贵报。足下既与相通,似宜略为整顿”<sup>[12]</sup>。而当时《时务报》在福建已有200份上下的订阅量。<sup>[9]</sup>再如邹代钧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间,代办发行的《时务报》约700份,而且这个数字比此前还略有下降。同期“《知新报》一百册。《农学报》五十册。《萃报》五十册。《求是报》《妇孺报》祈属暂停寄,缘无人购阅耳”<sup>[15]</sup>。由此可见,就算是《知新报》,销量也比《时务报》差了档次。这就意味着,时务报馆需要为其他报刊在全国的发行,动用自己的发行网络,而且颇增开支,所得却不多。其他报馆却可以专居一地,几乎不用什么成本,从《时务报》高额而稳定的销量中,获得可观的收入。那么,明知要吃亏,时务报馆何以甘为前驱?除了地处上海这个交通、物流中枢,汪、黄、梁等人都颇具大局观念外,最重要的因素,应该还在于“土道”二字。既然《时务报》的创立、拓展和维系,都有赖于举国士林的倾力相助。按道理说,也的确应当以举国之事,尤其是举国报馆之事,为自己的分内事。何况,诚如前述,此时的汪、梁,都只将办报视作中介手段,最终的目的还在于要合群力,以赈济危亡。对继起同行,鼎力相助,的确既能广结善缘,又能促进新知识、新观念在各地、各领域的进一步广布。再何况,如熊希龄、宋育仁、江标等人,于《时务报》也曾助力甚多,哪怕从人情世故也不好拒绝。

#### 四、结语

基于上述的图景勾勒,似可看到在戊戌期间新派中人那里,凭藉“士林”的交往场域与规则,各类资源不仅能在短时期内集聚,还能逐渐往亟须的区域和机构流转。在这样的运作机理下,新型建设不仅能影响到全国,还能在相当程度上借助同道间的互助共享生发于广袤的内陆地区。就此而言,维新运动方才

具备了全国性的意义。在此动态扩张的过程中,如时务报馆这样既依托群力维系,又在空间和社会上覆盖甚广的个体单位,实为汇集与转换的关键节点。笔者不揣冒昧,藉本文和其他相关论文的讨论,对其中机理也许能略窥鳞爪吧。

#### 参考文献:

- [1] 湘报.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1742.
- [2] 朱至刚.人脉与资金的聚合——从汪康年、黄遵宪合作看《时务报》的创立.近代史研究.2011.5.
- [3] 朱至刚.跨出口岸:基于“士林”的《时务报》全国覆盖.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10.
- [4]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2;312;316-317;493;517;262;253;82.
- [5]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649;2650-2769;2769;2744;2838;2639;2841;2741;2774;2781;2683-2689;2899;2909;2911;2570;2580;2900;2830;2749.
- [6]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3246;3254.
- [7] 强学报·时务报.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65.200.6266;65;64;65.
- [8] 强学报·时务报.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1590.2552;1315-1316;1038,1384,2206,1862.
- [9] 强学报·时务报.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2695-2697;2695-2696;2480;2627;2627.
- [10] 强学报·时务报.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4033-4044.
- [11] 上海,汪进士,七月十二日亥刻发,十三日午刻到,《张之洞存来往电稿原件》,第14函。所藏档号:甲182—185//,转自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78-279.
- [12]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409-1413;1720-1722;1038,1384;2206;1862;1621.
- [13] 强学报·时务报.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3180.

## How Can the Reform Become Movement: A Case Study on the Flow Direction of the Shiwubao(The Chinese Progress)'s Subscription Fee

Zhu Zhigang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taking an analysis on the amount, causes and the whereabouts of subscription which was defaulted by external newspaper-delivery office of the Shiwubao as a case study, tries to explore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we found the subscription fee from “relative” newspaper-delivery office tends to delay for a long time in general. The large share of “relative” newspaper-delivery office in the overseas sales volume (usually around 60%) leads a declared the subscription fee detained by large scale, long period in nationwide coverage (especially inland areas), of course, this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newspaper's own operations. But the fees owed by the ‘relative’ newspaper-delivery office” (up to nearly 17000 yuan),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these money was likely to be used as the start-up funding for other reformers’ local construction. Moreover, inland areas such as Hunan province, where local financial resources are not abundant, are the only alternative for rejuvenating fellow citizens. In this regard, Shiwubao spreads throughout the nationwide distribution network and serves as an intermediary platform for rejuven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with other people. Mutual aid in financial resources, manpower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really means rejuvenating the daily life of newspapers. In this case, it may be possible to have a glimpse of how the reform quickly spread out in space and groups and becom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national movement. In such a fluid sharing system, the Shiwubao office acts as the core out of its strength as well as the “Shi Dao” spirit.

**Keywords:** the Hundred Day Reform; subscription fee of shiwubao; resource integration; intermediary platform

■收稿日期: 2018-02-07

■作者单位: 朱至刚,厦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刘金波